近年日本中國史研究的變化

川島 眞* 著　林詩庭、許佩賢譯

一、前 言

日本自江戶時代（或更早以前），學習漢·支那的學問就極爲發達。從儒教到自然科學，廣泛地汲取大陸先進的文化、技術。他們發明了以訓點方式來解讀漢文的方法；這是日本特有的讀解法①，儒者藉以通解四書五經。江戶時代中期以降，這樣的學問與國學（日本學）、蘭學（經由荷蘭傳來的西洋學）並立，稱做漢學。

江戶時代的「中國史」即是屬於這種漢學的一部份。精通正史或史記等史書，爲武士的教養之一。②

到了明治時代，德國的實證史學傳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歷史學科尤其深受影響。江戶時代以來被認爲是漢學的一部分，而作爲武士教養的中國史學，至此轉而被定位爲歐洲的 Academism 之一，成爲所謂的「學問」（Academy）。

此外，當時也有留歐者指出，在歐洲，不只研究中國，而是盛行橫跨整

---

*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部副教授。

① 韓國另有早從韓文（Hankul）發明（1443 年）之前即十分盛行的漢文讀解法，稱爲吏讀。

② 19 世紀初期，特別流行中國風。從品味以至生活方式，如文人畫、日常用品等等，都以中國風爲最先進。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從中國輸入許多漢籍；其保存狀況之良好也值得注意。

臺灣大學圖書館

個歐亞大陸的研究。「東洋史」這樣的領域因而誕生（1910年）。③ 中國史（支那史）與印度史、西藏史、阿拉伯史等同被放在東洋史的範疇當中。歷史學科裡產生國史、東洋史、西洋史的分類，爲明治以降日本人的歷史觀帶來莫大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歷史認識是分成日本、東洋、西洋三者，將日本置於東洋之外而與西洋相對。由於東洋史原本即是東洋學的一部分，因此它當然也繼承了東洋學的性格。其中重要的性格之一即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我們可以說，東洋史學在日本東方主義的形成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文學部中另有繼承漢學傳統的「支那」哲學科及「支那」文學科等學科。反而是東洋史中的「支那史」研究，在上述背景及德國史學的影響下，與漢學傳統保持一定的距離。

戰前的「支那史」學，一改漢學中「斷代史」的敍述法，在撰寫「支那史」的通史上，有極大成就。同時，由於派遣留學生至北京，使得研究能與現狀得以保持適度的緊張感。於是，原本屬於教養的漢學，便轉變成學術性的支那史研究。④

當然，學術與當時的國策不會毫無關聯。日本在侵略中國之際，便以各種方式利用學術。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日本的中國研究也隨著日本的擴張而發展。隨著日本的侵略，有許多史料被帶回日本。⑤ 同時，爲了確切了解中國的情況，日本也在滿洲等地做了許多的田野調查。擔任這些田野調查工作的學者，研究領域極爲多樣化，不只是歷史學者，還包括法學者、人類

---

③ 東洋史是 Oriental History 的翻譯；在歐洲是屬於當時東洋學（Oriental Studies）的一部分。「東洋」一詞，在中文裡拿來和「西洋」對比，而有「東洋」即等同於日本的意思；這個語義在日文中是不存在的。東洋史所涵括的範圍，是指除去南北美洲大陸、歐洲、澳大利亞大陸之外的所有地域。關於東洋史學的誕生，可以參考以下文獻：五井道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青木書店，1976年）；江上波夫編著《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同上，第2集（1994年）。

④ 對於上述這種日本之「支那研究」的本質與流變，也有許多歐美研究者作過研究。例如最近美國的 Joshia Fogel 及 Stephan Tanaka 的研究即相當值得注意。此外，民國初期中國的歷史學者與日本的東洋史學者之間的交流，也是最近關心的主題。關於日本公文書中的「支那」一語，請參照拙著〈「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日本外務省の對中呼稱政策〉（《中國研究月報》571號，1995年9月）。

⑤ 日本在戰爭時期向中國購買或掠奪來的學術史料，有一部份被美國沒收，一部份歸還中國，但留在日本的仍然不少。例如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等處的收藏，大多是以戰前所收集的資料爲基礎。松本剛《略奪した文化　戰爭と圖書》（岩波書店，1993年）。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庫

學者、農學者等。⑥ 這樣的研究型態，誠然有許多問題，但未必一無是處。然而戰後世代對此有強烈的批判，批判的重點在於戰前學者參與政府對中國的侵略。

戰後的中國研究是從強烈的贖罪意識出發。許多研究者讚揚新中國，採納毛澤東的意識型態和道德觀。再者，不只是中國研究，整個日本的歷史學界都深受馬克斯主義史觀的影響，基於以生產力爲中心的單線式發展階段論，進行各種討論。然而，德國史學界所謂的亞洲社會論（亞洲停滯論），並不是這些讚揚新中國的學者所能接受的觀念。因此，他們提出中國社會並非停滯不前，而是穩健發展的論點；並且熱烈討論中國的哪一個王朝相當於發展階段論中的哪一個時期（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在馬克斯史觀中，對每個時代分別設定了一些「特徵」。例如，古代的特徵是奴隸性和帝國；中世則是封建性及遠距離商業的發達等等。這種設定是根據西歐史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說是西歐中心的發展階段論。⑦ 東大和京大之間的時代區分論戰，即是或隱或顯地針對國家論、奴隸性、封建性、市場、資本主義萌芽或絕對主義等議題而展開。⑧

這樣的研究有效地破除了中國是「落後停滯社會」的印象，也打破了中國因其特殊性而無法與歐洲作比較的言論。自 19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國史一直在這樣的討論下展開。即使日本史或西洋史的討論已經開始脫離發展階段論，在中國史裡，它仍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⑨

1972 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國交。這件事情對日本的「贖罪」意識頗具意義；但當時正好是中國的文革時期，再加上各種因素，因此並沒有對研究動向帶來很大的影響。許多研究者一面讚揚文化大革命，同時繼續批判日本政府。

在「前言」的最後，我想再指出一點，即當時的中國研究，其實可以說

---

⑥ 滿鐵的調查記錄，可以說是這類調查的代表性成果。有趣的是，日本的研究者對於將這些調查報告當作一手史料來使用一事，略有躊躇，使用時多會對當時參與調查的人進行訪談，然後才使用這批史料。相對地，以 P. Duara 爲首的美國學者，比較傾向於將這些記錄當作一手史料來運用。井村哲郎編《滿鐵調查部——關係者の証言》（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96 年）。

⑦ 小谷汪之《歷史の方法につい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年）。

⑧ 谷川道雄編《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河合教育研究所，1993 年）。

⑨ 這個時期所進行的中國史研究，古代史集中在中原，明清以降則集中於江南。

是「日本研究」。研究中國，是因爲在批判日本時，需要有一面「鏡子」加以對照。中國便是那面鏡子，最後的重點仍在於如何思考日本。這便是「作爲方法的中國」；研究中國僅是一個手段，他們並不想要在與日本無關聯的情況下去了解中國本身。這種想法的典型代表是竹內好，而在坂野正高身上也可以看到這種傾向。⑩ 這樣的研究方法，後來被認爲「沒有中國」，而受到批評。

二、1980年代日本之中國史研究的變化

上述那種根據馬克斯主義史學質疑亞洲停滯論、贊美新中國，最後又將問題關心投射回日本本身的研究型態，到了1980年代，開始產生很大的動搖。

1978年的三中全會，或是中國共產黨前此即已展開的路線變更，對於贊美文革的學者而言是極大的衝擊。甚至有些著名的研究者，對自己的文章負起責任而斷然「絕筆」。

19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從文革結束、冷戰結構崩壞、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絕望，乃至天安門事件發生。由於各種內外情勢改變，過去相信共產主義或新中國的研究者，開始對自己的研究展望感到不安，研究型態也因此產生很大的變化。中國史研究者開始批判以發展階段論爲基礎的馬克斯史學，而往社會史等新方向或新方法發展。此外，以一國爲單位的歷史學也開始受到批判。從《史學雜誌》每期所刊載的日本全國文獻目錄來看，80年代的研究成果似乎並不多；但是中國史研究（特別是近現代史研究）開始反省以往的西歐中心發展階段論以及共產黨史觀，而開啓了兩個新方向。第一是中國中心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在當時流行的文化相對主義

⑩ 戰後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研究者訪問中國有許多限制，而由於政治因素，他們也不到台灣或美國；大家都只在日本國內靠著大陸發行的資料集從事研究。在這種情況下，會把問題轉向內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戰前開始到戰爭期間，頻繁地前往中國做研究的人，與出生於戰中及戰後、沒有這類經驗的人之間，因爲問題意識的不同而存有代溝，也是可以想像的。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的影響之下，脫離以往的西歐中心史觀。⑪ 正好此時是 Asia Nies 經濟發展之際，因此，中國的近代化並非由於受到西力衝擊（Western Impact），中國本身自有其內在發展的邏輯，以及儒教與近代化等討論，在 80 年代極爲盛行。主張應考慮現實中國的狀況，以及至中國留學的年輕研究者增加，也是這個時期的特徵。會說中文的學生（Chinese - Speaking Student）實際在中國生活，即使並非全面性的接觸，但至少與中國社會有了接觸；在學問方面，到檔案館或圖書館看資料成爲理所當然的事；而田野調查及 Interview 等工作也使得研究逐漸精緻化。

第二，提出新的歷史學法則取代以前的史觀。就某種意義而言，若缺乏某些法則即無法解釋歷史，其實正是馬克斯史觀的遺產。尤其在討論近現代史時，很容易依據「近代化論」而採用「傳統－近代」的論述典範。例如，「民國史」突然變得熱門。這是由於研究者們試圖根據近代化觀點，對於在馬克斯主義或共產黨史觀中不值一提的民國時期，重新加以評價。此外，針對「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規範與社會」等議題的討論也很盛行。⑫ 明清時代的研究則盛行地域秩序和地域社會論，每年舉行明清史合宿進行討論。⑬ 近代史方面也出版了許多關於「中央與地方」的研究成果（廣島大學東洋史等）。

然而，這個討論方向也有許多問題。例如，提出在以前研究中原本不受重視的部分，重加審視的這種方法，造成一種現象，我們姑且把它稱爲「重新評價的類型化」。⑭ 比方說，對國民政府或袁世凱的重新評價，有時僅是將以往被賦予負面評價的事件或人物重新給予正面評價的工作而已。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對過去觀點的反省或解決方法——不論是對發展階段論及馬克斯主義的批判，或是採取近代化論的社會史取向——在日本史或歐美史中早已有人提出。本來，對發展階段論及西歐中心史觀的反省本身，便是

---

⑪ 這種論點有時似乎不難還元爲中國特殊論，但是因爲它也記述中國以外各個地方獨特的歷史（西亞史、東南亞史），因此不一定會成爲過去所批判的那種中國特殊論。在這一點上，P. Cohen 的下列著作對日本學界深具意義。（P. A. コーエン著，佐藤愼一譯《知の帝國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國像》，平凡社，1988 年）。

⑫ 代表性的成果即是岩波出版的《シリーズ　世界史への問い》。

⑬ 日本的宋代史研究則似乎有兩個方向。其一是把自己與唐以前同定位爲古代史；另一個方向是與明清史研究採取同樣的問題關心。

⑭ 小瀨一〈中國近代〉（《史學雜誌　1996 年の歷史學界－回顧と展望》1997 年 5 月）。

臺灣大學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西洋史產生的討論，因此「考慮中國的內在因素」、「脫離西方衝擊」等邏輯本身，依然是「來自西方的衝擊」。[15] 這一點，從結果上來說，和70年代以前並沒有什麼不同。

1980年代是日本戰後經濟成長告一段落的時期，加上美國的不景氣，因此，日本國內高唱經濟至上主義。此時，研究方面也以經濟史最盛，政治史中的外交史變成冷門。這個傾向持續到90年代的前半期。另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降，由於大學生打工所得提高及日幣升值，大學生從一年級開始便去自助旅行；隻身前往亞洲旅行的年輕人急速增加。這種現象爲90年代以降的中國研究提示了新方向。

在可稱爲「摸索時代」的80年代之後，緊接而來的90年代，是否能夠提示新的歷史像，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

三、90年代的中國史研究——走向地域研究[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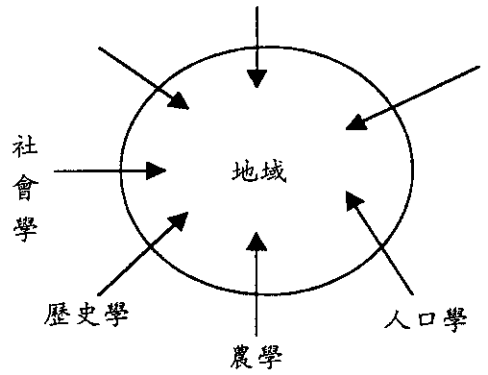
1990年代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其實並沒有解決80年代的問題。雖然想自內在因素解釋中國，結果仍無法完全克服仰賴歐美學說的缺陷。然而，儘管如此，90年代確實也累積了若干研究成果。

第一是在方法論上，提出了對歷史學及社會科學的質疑。例如，正式對國家史打上問號，而提示網絡論、將國家·近代相對化，或地域史、海域史等新架構。新的研究型態不再像以前那樣，試圖尋找某種單一架構；而是因應研究對象不同，採用不同手法，嘗試從多樣的觀點來進行多樣化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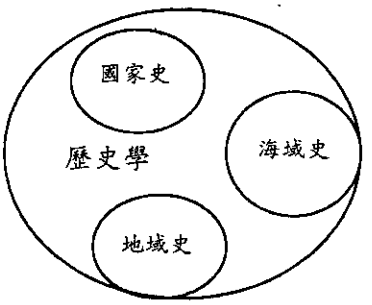
---

[15] 80年代後期，社會經濟史學會所舉辦的關於亞洲貿易論的研討會，對國家史式的歷史觀提出疑問，即是提示新歷史像的代表例子，此處無法詳細介紹。該會中由濱下武志、川勝平太、杉原薰等人提出的議論，與海域論等討論結合，直至現在都具有影響力。但是，事實上，也有人質疑《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系列所提示的「從亞洲出發」的觀點；認爲這一個系列雖然說是從亞洲觀點來思考，但實際上，在敍述的時候，也仍然依賴歐美的架構。岸本美緒〈アジアからの諸視角〉(《歷史學研究》676號，1995年)。

[16] 在日本，「地方」和「地域」這兩個詞彙的用法及語意指涉稍有不同。「地方」相對於「中央」，是屬於國家的一部分；而「地域」則可以超越國境，在概念上比較自由。



地域研究的概念



地域「史」研究的概念

第二是新實証方式的萌芽。學習當地語言、進行田野調查，並且搜尋文獻。⑰ 研究者們開始感覺到以往研究中存在著各種極限，例如僅從單一架構來理解、說明「中國」這個廣大對象時的極限，漢文史料的極限，或是近代史中已出版史料的極限等。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亞洲研究逐漸走向「地域研究」。從歷史學到農學，動員所有學科（discipline），並進行田野工作以理解地域的方法，已經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等單位累積了一段時間。這裡所討論的地域當然不限於「國家」，也包括海域等，定義極爲自由。當然，地域應該如何設定或是可以如何設定，也是地域研究的目標之一。中國研究在這一方面起步較晚，但無論如何，往地域研究的摸索已經起步，也提出了各種問題及假說。然而，正如東京大學教授櫻井由躬雄所指出，這類研究中有許多其實並不是以共同研究的方式對地域做綜合性的理解，而只是將自己學術研究的對象由國家轉爲地域而已。⑱ 近來也有批判指出：日本的研究生雖然研究「地方」，但其實只是將研究對象更細分化罷了。

我們可以說，現在日本的中國研究，同時包括了以學科爲工具的「地域研究」，以及作爲一種學科方法的「地域研究」二個方向。

---

⑰ 就這種研究型態而言，中國史研究較爲落後。東大東洋史裡研究東南亞、南亞的學生，在大學或研究所時代，到自己所專攻的國家、地域（不僅到新加坡等先進國家，也到高棉、寮國、緬甸、印度等地）留學二、三年，早在80年代就已經是很自然的事。西亞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

⑱ 櫻井由躬雄〈書評·「地域史とは何か」〉（《週刊讀書人》1997年10月17日）。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

以下，我想介紹最近關於中國研究幾種較有名的說法。

1）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系列，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

1993年所出版的這個系列，是以將「日本」相對化爲目的，收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各方面所進行的亞洲研究，內容十分多樣化。⑲

這個系列所標榜的「考慮亞洲的內在因素」，在當時深受矚目；雖然仍然是以脫離歐洲中心主義爲目標，然而其特徵在於它想將「日本」相對化的嘗試。此外，它整理出以下幾種研究觀點及方法，也是相當重要的特徵。

(1) 學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與田野調查（Field Work）

(2) 文化的研究方法（儒教文化論、民族主義、中華思想）

(3) 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巨觀的手法）

以這樣的手法所進行的「地域研究」，確實引發了各式各樣方法論的討論。他們認爲不要採取單一的手法，而應該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找出適合自己研究對象的手法；只有在發現此方法時，才有可能進行分析與討論。⑳

這個系列對於日本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將亞洲近代相對化，以及此後如何思考亞洲研究等方面，有相當大的貢獻。

2）濱下武志·辛島昇編《地域の世界史》系列，山川出版社，1997年

本系列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重新檢討社會科學與歷史學中的「知識體系」。面對環境問題、老人問題等隨著近代化而產生的問題，日本也開始重新思考「近代」社會，以及歐美型近代化等問題；其中一個走向便是「在亞洲內部尋找解決法或另謀出路」。在這個意義上，重新檢討以近代 Academism 爲基礎的社會科學及歷史學的嘗試，似乎也開始流行起來。

此外，本系列也對中國研究中「地域研究」的形式發出疑問。

---

⑲ 90年代以後，亞洲將爲世界經濟中心的言論流行起來，「東洋」這個語彙消失，而開始全面使用「亞洲」(Asia)。

⑳ 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1］《交錯するアジア》，東大出版會，1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之，我們可以說，以往的地域研究，多在討論怎樣才是一個地域，例如說是不是具有什麼樣的向心力，才能成爲一個地域。也就是說，是以向心力的有無，來決定地域的成立與否。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國家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具有凝聚力的一個地域。然而，如果這樣的話，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如此一來，地域研究是不是便只是將研究國家的方法應用在空間上的地域而已呢。㉑

的確，東京外國語大學的中嶋嶺雄及慶應大學法學部於 80 年代所進行的「中國研究中的『地域研究』」，是先驗地設定「中國」這個框架，然後再去思考可以怎樣去理解它。然而，這樣的方法，與其說是將「中國」相對化，不如說反而將「中國」絕對化了。

這個系列的編者，不僅將以往的社會科學加以相對化，對於往那個方向進行的「地域研究」也加以批判。

其次，我們來看看從政治學的角度所做的地域研究。

3) 小島朋之·國分良成等《東アジア》，自由國民社，1997 年/土屋健治編《講座現代アジア》，東大出版會，1994 年，全 4 冊

前者設定的地域是「東亞」，而將其領域定義爲中國、台灣、日本、南北朝鮮、蒙古等國家集合體。然該書的分析，距離成功的學際研究（Inter－disciplinary）似乎尚有一段距離。

後者則是很坦誠地承認，地域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確有現實上的困難。

不用說，地域研究的目標是對於某個特定地域做綜合性的理解。但是，現階段的社會科學發展，還沒有發展出一套綜合性的理論，足以配合這種目的。個別學科越是深化，由一個學者來做學際性研究的困難度便越大。共同研究雖然是有效的方法，但是統合並非易事。儘管

㉑ 濱下武志〈歷史研究と地域研究　歷史にあらわれた地域空間〉（濱下武志·辛島昇編《地域史とは何か》，山川出版社，1997 年）P22.

臺灣東亞學術期刊資料庫

> 如此，不論是學術上還是社會上，都強烈要求對於某一個地域能夠有綜合性理解。㉒

地域研究非常困難，那麼爲什麼需要呢？這是因爲「從快速發展的亞洲各地域所導出的一般性社會科學的法則，也有可能對21世紀新社會科學方法的創出有所貢獻。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亞洲研究對社會科學的重要性。」㉓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想法與2）有共通之處。

那麼，歷史學方面的情況如何呢？東京大學文學院東洋史學科的研究所，於1995年解體，而設計出「東アジアコース〔東亞課程〕（包括以前東洋史中的中國史學科、中國思想與文化學科，以及中國文學科）」等地域研究課程。4）是由原東洋史學科的教授所編纂的書。

4）尾形勇、岸本美緒編著《中國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

本書對於1）、2）所談的問題，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說是繼承傳統的歷史學形態而執筆的。

> 特別是在經濟方面，超越國家或地域的界線，世界不斷走向一體化的現今，以「一國」爲對象的歷史敍述有怎麼樣的意義呢？對於這樣的疑問，特別是關於中國的討論，我們必須注意兩國長久以來歷史上（如上的）累積。㉔

這裡認爲，「中國史研究」這種「國家史」研究畢竟還是有它的意義。這種說法，與1）、2）二者的方向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有趣的是，本書的序章所設定的課題卻是「『中國』是什麼」。該章如下述般將中國相對化。

㉒ 土屋健治編《講座現代アジア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國民國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Pii。

㉓ 同上。

㉔ 尾形勇、岸本美緒編著《中國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Pi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被總稱爲「中國」的東西，是數千年來，每個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活動中，不斷變動而形成的。「中國」這種觀念，是每個人對自己的過去，不斷地隨時加以解釋，然後組織或重新組織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思想的產物。到了近代，在列強侵略的背景下，「中國」這種國家意識在每個人心中大爲加強；不論是在領土的空間意義上，或是作爲一個人群集團，「中國」史上的「中國」像從如未此輪廓鮮明。㉕（岸本美緒著）

本書也是意圖將「中國」像相對化。但是，與 1)、2）比起來，算是比較保守漸進的；而且也沒有如 3）那樣欲向方法論挑戰的抱負。

如上所述，1990 年代的研究，總的來說，是向「地域研究」的方向前進；加上亞洲經濟發展的背景，因此嘗試去解明足以說明亞洲的方法論，並且希望能從該處將以往的架構加以相對化或重新建構。

但是，各個學科的對應稍嫌遲緩，與地域研究的距離也各不相同。地域研究可以說仍在嘗試錯誤的階段。只是，與 80 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此時提出了許多說明亞洲的方法論或思考方式。

以日本爲首，整個亞洲都處在不景氣狀態的今日，我們應該稍微冷卻一下過熱的「亞洲風」，重新冷靜地選擇對象；這應該是今後的課題。

此外，還有另一個與地域研究不同的立場，即是將國家相對化的嘗試；例如，衛生史、教育史、言說史等方面的討論，本文無法詳細介紹。有關這種動向的詳細情形，可以參考每年刊行的《史學雜誌　回顧と展望》。

四、結　語

筆者研究的是中國外交史。在地域研究或「將國家相對化」成爲主流的現今，爲什麼我還要從事原則上以國家爲單位的外交史研究呢？這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即使在國境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具有絕對意義的現在，也仍然有僅以經濟的邏輯無法完全說明的面向。正是因爲在人、物往來頻繁的現

㉕ 同上，P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第二，我選擇20世紀初期爲研究對象。這是一個地域、地方角色十分鮮明的時代，我相信正好可以藉此思考地域·地方與外交的關係。

但是，對於中國史研究中90年代以後才流行起來的這種地域研究，也有人加以強烈批判，認爲這不過是「80年代的學術流行」。並且，當亞洲再度陷入經濟混亂的現在，也產生一種新的疑問：思考亞洲、就亞洲來思考，果眞具有意義嗎？大家開始認爲，結果，最重要的或許是「全球標準」。㉖

最後，我想提一下教育行政的變化作結。教育行政以及社會要求的變化，其實才是今日對日本的研究者造成直接衝擊的主因。

在教育行政方面，既有體制被拿出來重新檢討，或被要求對社會及納稅人作回饋；此外，也有人提出研究內容及教育活動須向所有市民公開，並且應將評量委之於學校外部等要求。甚至，最近文部省也開始考慮要將評分委託給外部。尤其文科、特別是教育學院的存在意義受到懷疑，而成爲合併或廢止的對象。本身的存在意義無法吸引社會的學院或科系，似乎立刻就要面臨生存危機。㉗

社會方面也很敏感。納稅者（tax payer）過問國立大學的業務，似乎也變成理所當然的權利。私立大學方面，學生人數減少，有些學校無法成功地向外部訴求其存在意義，由於應考學生減少而倒閉的情況也開始發生。

在這種狀況下，歷史學應該也要向社會主張其必要性吧?! 換穿地域研究的「外衣」，也是由於這種背景。只要掛上「地域研究」的招牌，至少就可安心一時。適合21世紀學問的「結構改革」，今後應該會持續一段時間。

（本文獲豐田財團97年後半期研究獎助）

㉖ 青木保·佐伯啓思編《「アジア的價値」とは何か》（TBSブリタニカ，1998年）。

㉗ 東大教養學部的《知の技法》（東京大學出版會），或是東大社會科學研究所的《20世紀》系列（東京大學出版會）之編纂出版，有一部分原因即是想向外部訴求自己的存在價值。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